

导 论

0.1 基本范畴

鉴于常常因为概念歧异而引起纷争，同时也是为了有利于理论研究的顺利进行，首先将本文中涉及到的重要范畴加以界定和说明是十分必要的。

0.1.1 投资

也许是由于投资活动司空见惯的缘故，人们在使用投资一词时，对其内含和外延一般不予区分和规定。然而，在不同文献或不同场合，投资本身的含义却可能相去甚远。顾海兵教授列举的对投资内含有代表性的解释即达七种之多，[1]即：

经济活动论——这种观点认为投资是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货币或其他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

特种资金论——这种观点认为，投资是一种特种资金，这种特种资金属于垫付资金，它是要回流的，要增殖的。

经济活动与特种资金两重论——这种观点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混合。

证券流通论——这种观点认为投资就是证券投资。

人力资本论——这种观点认为投资就是人力资本增加。非人力投资为人力投资服务。

固定资产论——这种观点认为投资就是指固定资产的购建。

资本增加论——这种观点认为投资是流量，资本是存量，投资是资本存量的增加。

而顾海兵教授自己的定义为：通过投入一定的经济性资源以增加主体的直接和间接发展能力的行为过程。 [2]

上述几种观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但是，一方面出于充分利用政府统计资料的目的（我国的政府统计中，一直将投资仅限于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投资一词时将仅指固定资产投资（类似于固定资产论），并且主张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投资，认为投资是由投资融资、投资决策与投资管理等三个阶段相互衔接构成的一个连续的资本形成过程。

0.1.2 制度与制度创新

关于制度概念的争议，不仅存在于不同学科之间，即使同属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分歧也很明显。 [3] 本文为了研究的需要，从内容上将其定义为：制度既包括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也包括组织或机构。这一定义不同于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解——多指习惯和规则，也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制度——多指政治制度或规章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将制度作为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来理解的（第一章将详细阐述和分析），这种创新理解对于充分利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和科学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制度创新则是指对现有制度的改变，即规则的调整或组织的变动。

0.1.3 投资制度与投资制度创新

根据以上定义，顺理成章地得出：投资制度是影响投资过程（包括投资融资、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的一系列规则或组织机构，投资制度创新则是指投资规则的调整和投资组织的变

动。

考虑到本文对制度与体制关系的特殊理解，对投资制度创新的研究是与投资体制变迁的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为了区别研究的需要，对各个历史阶段经济体制和投资体制变迁的称谓是有所不同的，如计划经济与投资体制变迁、商品经济与投资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与投资体制创新等。

0.2 研究背景

0.2.1 现实背景

选择投资作为论题，主要是基于投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重要性。经济增长对不发达国家永远具有“挡不住的诱惑”，而要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没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是难以达到的。六十年代以后，紧随日本而迅速崛起的东南亚诸国，其成功秘诀之一就是充分动员国内资本与积极引进国外资本，长期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4]建国之后，我国为了实施赶超战略，也采取了高储蓄与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尽管投资效益较差，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1953—1989年，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达78.37%。[5]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投资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其波动也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实际固定投资基本上和实际GNP一起波动。[6]在中国，1954—1989年的36年间，投资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波动方向相同的年份共为29个，占80.3%。同时，年度投资规模具有比国民收入更快增长的趋势，而且年度投资规模的波动幅度远远强于国民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7]

选择投资制度作为投资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考虑到投资制度与投资制度创新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夯实投资体制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更好地为“两个转变”服务。很显然，投资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投资效益，实现更高的制度绩效，因此它将会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投资制度作为整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迁与创新必然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0.2.2 理论背景

本文开展投资制度创新研究既直接从现有的投资理论出发，也注意借鉴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

一、投资理论研究现状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投资问题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特别关注，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对投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可是，“投资理论仍是经济学中最缺乏了解的领域之一。投资的不稳定性仍是经济周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能对投资行为作出预测，仍然是稳定政策的一个主要缺陷。” [8]

在西方，对投资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支派：一支是研究金融意义上的投资，“投资是投入现在的资金以使用利息、股息、租金或退休金等形式取得将来的收入，或者使本金增殖”，因此，“其投入用于毁灭性导弹的政府债券和扩大设备的公司出售的新股份，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样的。” [9]

另一支是研究经济意义上的投资。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时，使用的就是投资在经济意义上的含义。这时的投资包括三类：非住宅性固定投资、住宅性固定投资和存货投资。在探讨投资需求函数时，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沿着由微观到宏观的思路展开讨论的，即将微观的企业投资函数加

总得出近似的总投资函数。在讨论企业投资决策时，使用的是边际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合理引入应归功于哈佛大学的 D. 乔琼森教授提出的投资模型，正是在这个投资模型中他采用了抽象方法，将企业的投资决策看作是一个对资本设备租用量的选择，从而更易于理解投资的边际成本和运用边际分析方法。

[10]

在股票市场非常发达今天，耶鲁大学的 J. 托宾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确立投资函数的方法，即托宾系数或托宾的 q ，它等于企业的市场价值除以企业的资本价格。当 $q > 1$ 时，企业进行新的投资；当 $q < 1$ 时，企业就不投资，甚或要减少它的资本存量。 [11]

当然，其他经济学家还使用了资本边际效率、乘数与加速原理、预期等概念来分析与投资有关的投资需求、投资波动、投资滞后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存在的“投资饥渴”模型，这个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投资膨胀问题也十分有用。

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战略，并且由于投资监控的相对容易性和投资资料的完整性，因而不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对投资的研究和关注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我国投资理论现状，大致有三种研究模式：一类是从微观上入手，主要研究具体投资项目的评估与决策、筹资与管理等方面内容。当前，日益兴起的证券投资分析也多属此类。另一类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投资领域的重大问题，如投资规模膨胀、投资结构失调、投资效益低下以及投资体制改革等等。最后一类重点是整理建国以来的投资史料，并从中探讨一些我国投资运动的规律。

二、制度经济学研究现状

尽管制度经济学的渊源可以向上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派，但其真正成为一门较完整经济科学却是以 R. 科斯和 D. 诺思等人为代表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标志的。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政府顾问施蒂格利茨曾说，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角度来解释并检验它的结果，21 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它将对越来越多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 [12]

鉴于新制度经济学利用正统经济理论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已成功地揭示出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将其称为崭新的学科，甚至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相提并论的观点并不为过。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可谓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它对于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制度的供求与均衡以及制度创新模型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13]

新制度经济学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其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很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现实。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基本问题的研究（如对计划权利交易、渐进式改革等的研究）以及体制变迁案例的研究等等。 [14]

就上述及的理论背景来看，一方面投资理论研究中关于投资体制和投资制度的研究属于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既缺乏对体制与制度问题的区分与衔接，也缺乏对制度体系子系统如投资制度的关注与研究，因而本文进行投资制度创新研究便具有双重的理论意义，既丰富了投资研究内容，又拓宽了体制和制度研究的领域

0.3 分析方法

科学的理论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我国，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必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本文亦不例外。

当然，在经济研究实践中具体运用的分析方法则可依据不同标准分为很多类：如总体分析与个体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系统分析与外部条件分析等等。 [15]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坚持中庸之道，力图兼容并蓄地使用各种必要的分析方法，实现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效果。不过，任何研究都必然有其相对侧重的分析方法，就本文来看，将特别重视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的统一、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统一、系统分析与外部条件分析的统一以及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统一等等（第一章将详细阐述）。

0.4 主要观点

本文通过对中国投资制度创新的研究，力图体现以下主要观点。

1. 对投资体制和投资制度的描述和分析建立在将投资分解为三个连续的运动过程基础上。本文首先从投资主体角度出发，按照投资资金的运动过程将投资界定为由投资融资、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等三个阶段组成的一个连续的资本形成过程。这样，对投资体制和投资制度的研究也是遵循对投资的重新理

解而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的，即包括投资融资体制（制度）、投资决策体制（制度）、投资管理体制（制度）等三部分。这种按照投资运动全过程来考察投资体制和投资制度的分析方式，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保证研究内容的全面性，融资、决策和管理几乎涵盖了经济意义上的投资的全部活动内容；二是研究方式的连续性，融资、决策和管理不仅是投资的三个子系统，更是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子系统。

2. 将投资体制和投资制度变迁的考察置于更广阔的经济体制变迁背景之下。从层次上看，投资体制包括投资制度和投资运行机制两部分内容，因此投资制度变迁从属于投资体制变迁；但是，若从外部环境来看，投资体制又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变迁特征必然要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演变的影响。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改革开放之前），投资体制必然带有传统经济体制所普遍存在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基本特征；在商品经济背景下（改革开放之后至十四大之前），受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取向特征的影响，在投资体制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十四大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也呈现出了边缘化、利益化和制度化的趋势，投资制度创新将会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 无论是从长期的历史演变规律来看，还是从短期的逻辑分析结论来看，投资制度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重视历史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当然因其理论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常常是大相径庭的。就本文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投资体制和投资制度变迁的过程与特征进行的考察与分析来看，一是认为在各个时期投资体制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共同特征，将会在今后的投资体制与投

资制度变迁中继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综合性、依附性、行政性、渐进性和实践性等特征，必然会在以后的投资体制改革与投资制度创新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一是认为从投资体制改革中呈现出的良好趋势来判断，当前正处于投资制度创新措施急待涌现的关键时期。就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经常使用的成本收益分析与供求分析等方法来对我国投资领域现状进行的剖析来看，由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外在于现存投资制度的潜在利润已经出现，并且既能找到获取潜在利润的实现途径，也能通过必要措施缩短制度创新的时滞，所以投资制度创新的时机已经到来。

4. 投资制度创新将按投资过程分别描述，并从解决存在于各个投资阶段的内在矛盾出发，提出相应的投资制度创新措施。就投资融资阶段来看，存在着两对主要矛盾，即资金来源多样化与直接行政干预过多的矛盾、企业融资结构失衡与居民融资渠道单一的矛盾，为此应在宏观上推进金融深化的步伐，微观上进行融资手段的创新；就投资决策阶段来看，也是存在着两对主要矛盾，即决策的经济性要求与决策者的非经济性考虑的矛盾、决策权限与决策风险不对称的矛盾，为此应一方面建立相对规范的投资决策主体体系，一方面建立比较完善的投资决策风险约束制度；就投资管理阶段来看，大致存在着三对主要矛盾，即投资管理内容的复杂性与投资管理方式简单性的矛盾、投资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与投资管理的软约束之间的矛盾、投资服务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要求与投资中介组织的行政依附性之间的矛盾，为此应该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改进投资管理方式，构建比较完善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加强投资项目管理力度，形成比较完善的投资风险约束制度，三是进行投资中介组织创新，培育比较完善的投资服务市场体系。

0.5 结构安排

本文除导论之外，共由 6 章组成，按照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 1 章）：一方面指出本文开展投资制度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一般理论基础、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充分利用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理论来进行投资制度创新研究；二是提出本文在理论上和概念上的一些创新理解，以开辟投资研究的新视角。

第二部分（第 2、3、4 章）：通过对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以来及 92 之后三个历史阶段投资体制变迁的考察与分析，一方面找出投资体制演变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对当前所处的历史时期作一判断。

第三部分（第 5 章）：利用新制度经济的一些分析框架设计中国投资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工具对投资制度创新进行可行性分析。

第四部分（第 6 章）：从投资融资、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三个方面，分别针对各自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相应的创新设想和建议。

注 释

[1] 若加上顾海兵的观点应为八种。

[2] 详见《关于投资概念的系统观察》一文，载《经济学消息报》1995 年 11 月 17 日。

[3] 详见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第 109—120 页。

[4] 仲继银, 胡春:《东南亚:成功的外向型经济》第二章, 武汉出版社 1994 年。

[5] 侯荣华:《宏观经济管理学》第 172 页。

[6] 参见(美) R. 霍尔, J. 泰勒:《宏观经济学》第 223 页插图,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

[7] 详见林森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透析》第 10—14 页。

[8](美) R. 科利拉斯, R. 桑恩:《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载《世界经济文汇》1985 年第 5 期第 75 页。

[9](美) H. 杜格尔, F. 科里根:《投资学》第 3 页。

[10]、[11] 同 [6], 第 226 页和第 239 页。

[12]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 1 页。

[13] 参阅:《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下篇。

[14] 参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第 10 页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 251 页。

[15] 详见侯荣华:《论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 载《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6 年第 3 期。

第 1 章 投资制度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

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研究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就客观实践活动来说，无论实践者主观意志如何，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理论为行动基础，而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就学术研究过程来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会看得更远”，因而无论是在原有理论基础上的演绎，还是进行理论的创新，都必须以既有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更何況本文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投资制度创新，因此理论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

1.1 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基础

在我国，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本文研究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般理论基础或者说其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次上：

首先，马克思主义为包括本文研究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基础。物质与意识相互作用的科学论述必然会决定着本文的立论基础与最后结论，而普遍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又是本文最基本的方法论基础，同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则体现在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中。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征对本文的

选题与研究有重大影响。我们知道，正统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即在给定各种背景条件的情况下，研究经济的运行过程和经济变量的决定。而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这些背景条件或者是给定不变的，或者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这样其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就不在理论研究体系之内，不构成研究对象。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将经济研究的视野置于更广阔的领域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被正统西方经济学视为外生变量或背景条件的技术进步、消费偏好、人口变化、制度变迁等等都是内生变量，并且在它们之间还具有某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函数关系。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开放体系中，任何经济因素都可以作为内生变量存在，因此它既可以包容其他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同时又为其他理论所没有研究或无法研究的问题，提供基本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因而，可以说，本文致力于投资制度创新研究，一是因为对投资研究的兴趣所致，另外也是受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结构的影响，力图将传统投资理论所忽视的制度创新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之内。

再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无疑对本文进行投资研究具有最直接的指导意义。尽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从流通过程进一步阐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其内在的深刻矛盾，但是如果撇开资本主义的形式，那么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化生产。由于投资就其实质来看不过是固定资本的再生产，因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就可以直接作为其深入研究的理论基础。例如，马克思在资本循环理论中阐发了三个阶段、三种形式和三种循环的统一，说明了产业资本各种形态的并存性和运动的连续性，本文在对投资的理解中依据这一原理将投资活动划分为由投资融资、投资决策和

投资管理三个相互连续的阶段组成的统一过程。马克思在资本周转理论中强调了信用制度对加速资本周转的意义，因此对于投资的研究应考虑到融资活动；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周转速度对预付总资本量的影响，即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周转速度与预付总资本量成反比，以及资本周转速度对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即在预付总资本量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周转速度与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成正比，这些论述显然是投资效益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中，主要是说明了社会再生产需要具备的条件，即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 [1] 这样，按比例进行社会再生产的一般原理就成为进行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基础。

最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与得出的科学结论同样对本文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贯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始终的科学抽象法以及历史与逻辑分析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同样为投资制度研究所必需。另外，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些制度学者甚至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 [2] 可是，“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 [3]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在投资制度创新研究中将会居于支配地位。总之，马克思的许多科学论述都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

1.2 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借鉴

如何正确地引进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一直对此争论不休。仅就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派为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而言，不同观点就有很多种，[4] 例如：

“真伪科学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而其他各种西方经济理论都属于“庸俗经济学”，是“伪科学”，不值得研究和学习。

“实质与形式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经济运动的实质（社会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则是经济运动的形式（物质关系），因而前者揭示了经济现象的本质，而后者只能描述现象。

“社会关系与运行机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具体运行过程。

“范围不同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基于内在矛盾而发展演变的逻辑，而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研究的则是现实日常经济生活的规律。

“角度不同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加以肯定，然后着重考察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身，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主要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

当然，无论何种观点和主张，都不讳言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研究方法对分析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借鉴作用。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同样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理论出发点。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除了重视借鉴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动态分析、系统分析等分析方法外，还注意借鉴一些非主流学派的经济分析方法，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等等，另外作为西方经济学较新学派的新制度经济学主张在对制度变迁的具体研究中使用传统分析方法如供求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等，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注意适当应用。

1.3 投资体制改革理论：直接理论依据

基于生动实践而发展起来的投资体制改革理论是本文开展投资制度创新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1.3.1 投资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

投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反映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阶段。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投资活动的重要性。投资活动在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入扩张，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也高于韩国等大多数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水平。因而，投资就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即使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够顺利实现两个转变之后，投资活动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这是由于投资具有既代表即期需求、又代表未来供给，既影响总量平衡又影响结构平衡的内在特性。因此，从投资活动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

多方面的、深远的、巨大的影响可以推论，投资体制改革毫无疑问地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或关键。

二是投资体制的关联性。投资体制作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涉及的方面很多，它和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企业体制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就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而言，如果不转变计划管理职能，不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不提高制定计划的开放度、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没有科学的并且可操作性的产业政策，那么投资体制特别是投资决策体制就很难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就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而言，如果不能改变“财政包干”体制的影响，不实行完善的分税制，不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划分，那么各地出现的争上新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结构趋同、重点建设资金到位率低等现象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就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而言，如果不能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开，不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来整顿金融秩序，则投资膨胀、长线过热、短线过冷的态势就难以得到根本抑制。就企业体制和投资体制而言，如果企业经营机制不转换，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企业没有投资决策权，企业产权界定不明晰，那么要重新塑造投资体制的微观基础，要在投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要切实推行法人投资责任制等等，就失去了微观依托和保证。以上分析表明，由于投资体制与其他经济体制的高度关联性，使其具有了改革程度指示器的作用。

1.3.2 投资体制改革理论的主要进展

一方面因为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当然包括投资体制改革）为改革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研究素材，另一方面投资体制的重要地位也激发起大量理论研究者的深入思考，因而投